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二十三期 二零一四年五月七日

编者的话：文革十年，噩梦一场。当人们从梦中醒来，最直接的反应当然就是不要再陷进去。人们再也经不起折腾了。百姓不愿再受穷，干部和知识分子不愿再挨整……人们要求无法无天的权力受到约束，使国家走向民主，社会获得自由，人民免于恐惧，政治遵循文明的规则，不再是野蛮血腥的权斗。最后，要摆脱那个禁锢着人们头脑的宣扬仇恨与暴力的意识形态符咒。人们要求一个宽松的环境。

但是，随着权位的巩固，继任者也越来越像毛。一度悬于头顶的利刃已操之在手，就免不了要扬威立万，舞弄一番，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全体，对外“自卫反击”，对内“清污严打”。但毛的遗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意味着一党专政和无限的权力，这是继任者想要的；另一方面，它又勾起痛苦的回忆，并且制约着在经济上“走资”，这是继任者不想要的。于是就有了“准确完整”——要想要的，去掉不想要的。结果顾此失彼，颠三倒四，最后弄得大开杀戒，然后“不争论”了事。朱厚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搅进来的。

在《是谁举荐朱厚泽任中宣部长》一文中，列举可能推荐过他的人有好几个，但其间的差别很大，很难把他们归为一类。这或许反映了当时的氛围——以意识形态为归依的官僚集团众声喧哗，以利益为归依的官僚资本集团及其自我确认的集团意识尚未形成，人们大多认为改革开放是历史大势，——而邓力群的前后不一不过反映了事态后来的变化，也体现了反覆小人的无常本色。

尽管当时的推荐大多是善意的，但现在看起来，却是把朱厚泽推入了政治斗争的暴风眼。不过，若论功罪而不论祸福，朱厚泽担任中宣部长无疑是一大功业，正如此前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共同开创了一个中共掌权以来最为宽松的年代，并使中宣部成为思想解放的大本营。但这一切最终却是昙花一现。也许，关键倒不在举荐人，而取决于拥有决定权的人——可以让人上，也可以让人下。这就是党的用人制度。这一制度允许拥有最终决定权的人无需责权名分，就可以无视制度，操弄国器，随意颠倒党国权位，无论胡、赵，何论朱厚泽。但是，若说胡耀邦与朱厚泽们仅仅是工具与棋子，倒也不尽然，否则就不会有后来遗弃他们时的狰狞嘴脸和气极败坏了。

党的宣传部门自有其使命和归宿，不是胡耀邦和朱厚泽们可以改变的。朱厚泽入主中宣部，幸耶，不幸耶？

是谁举荐朱厚泽任中宣部长（外二篇） 郑仲兵

1985年7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朱厚泽为中宣部部长，1987年1月28日离任。

朱厚泽主政中宣部只一年六个月。但是他留下的口碑，超过到现在为止除胡耀邦以外的所有中宣部长，他的“三宽部长”美名，可与胡耀邦的“思想建设部”、“思想解放部”部长媲美。

是谁举荐朱厚泽任中宣部长？

一、众说纷纭

有说是邓力群，有说是宋任穷，有说是乔石，有说是习仲勋，有说是胡启立，有说是李锐，有说是胡耀邦。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问过朱厚泽，他也说不出来。现将有关情况，并朱厚泽和他们曾经的关系，简述如下。

1、邓力群的自诩

在朱厚泽任中宣部长期间，我一直认为让朱厚泽任中宣部长的始作俑者是邓力群。我记得很清楚，在朱上任不久，邓力群曾在中宣部的一次会上说，朱厚泽是他“发现”的，并加意赞扬朱厚泽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的两篇论文。一篇是1981年在中央党校写的毕业论文《怎样培养新一代接班人》，1983年他代表贵州省委在遵义开的中央党校哲学年会上的讲话《培养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新一代领导干部》，就是在这篇论文基础上修订的。另一篇是1984年在贵州省委全会上的讲话《统一认识，自觉推进全面改革的发展》。朱厚泽根据贵州的社会历史特点和自然条件，提出“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思路。当时，我对邓力群用“发现”一词非常在意，心想：被他发现的会是好文章？

据我所知，朱厚泽和邓力群本是南辕北辙，素昧平生。1985年4月23日—6月8日，邓力群赴四川、贵州、湖北三省考察，在贵阳才初次与已是省委书记的朱厚泽接触。邓力群后来回忆说：“这个人反右时（郑按：应是四清时）受过打击，但没有因此消沉，而是读了许多书。当时对他的印象不错。”（《十二个春秋》352页）关于邓力群说他推荐朱厚泽当中宣部长，我还接触过两个线索：一是朱厚泽和我说过，1985年7月下旬他到北戴河参加中央会议的当天下午四时，邓力群在下榻楼里约见他，并和他共进晚餐，邓力群虽然也讲了些中宣部的情况，但主要是在说他的好话，特别赞扬了他的两篇论文，并向他表露是自己推荐他当中宣部长的。还有一个是，当年在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工作、代理过朱厚泽秘书的孙方明，在纪念朱厚泽逝世一周年写的《忆睿智宽厚长者》中也提到，1985年秋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期间，邓力群也曾对他说：“朱厚泽到中央工作是我推荐的。”

2、宋任穷的提名

但是，后来邓力群的口气变了。他在2005年出版的《十二个春秋》中就说是宋任穷提名的。书中写道：

“大概从四川、贵州回来以后，我正式向胡耀邦、胡启立提出自己不想当宣传部长了。他们也乐得我不当，故而答应得非常爽快，说积极物色人选。用了一个月时间，先是宋任穷提了一个名单，选了几个对象，偏重于朱厚泽。胡启立又专门到贵州去做了一些调查。回来后就确定了，由朱厚泽接任中宣部长。”

这里，邓力群是有意掩盖了因“清污”而名声扫地的事情，强调自己是主动提出让位，而且把中央物色新的中宣部长和宋任穷考察朱厚泽的时间故意放晚，但所云宋任穷提名朱厚泽的情况基本属实。

事实是，1985年5月，仍为中央分管组织和干部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宋任穷，为了选择新的中宣部长到了贵州，邀请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第一把手）的朱厚泽——他的重点考察对象，一起去安顺、遵义等地考察，一边看一边谈话。这次考察后中宣部长的人选基本上就锁定为朱厚泽了。但宋任穷为什么提朱厚泽，或是谁向他推荐的？仍然待考。在此顺便一表宋朱过从的历史情况：

一是，说来也巧了，宋任穷在1950年代初期任中共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曾到贵州考察工业并到了贵阳烟厂；当年才二十出头的朱厚泽是贵阳市烟草公司的党委书记、经理，是他接待并陪同了宋任穷。

二是，光阴荏苒，约三十年后，1982年底，贵州省委选定朱厚泽进常委会并报中央，又是宋任穷代表中央给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打电话。宋问：朱厚泽任省委书记行不行？池答：行。又问：把他位子往前挪一挪名列第二行不行？池是个明智又开明的老同志，明白中央有意让朱过渡接班，实现新老交替，便回答：当然可以，还可以把他排在我的前面。（参看刘学洙《我眼中的朱厚泽》上，《贵阳文史》2008年第6期。朱厚泽在回忆池必卿时，也和我讲过这个故事）

对于领导罕有到家造访的朱厚泽，到京不久还登门拜访了宋任穷。朱厚泽对我回忆说：“因为到贵州时（按指1985年宋到贵州）我陪着他看，看了之后我说，有些情况将来再给你汇报。所以到京之后就到他家里去汇报。”朱厚泽说：“从年轻时开始，他在我们心目中就是老爷子，很大的老爷子嘛。他对我们这些小家伙是既亲切又随便的。他刚吃了晚饭。他有个习惯，晚上要弄一盆热水烫脚，当时他一边招呼人打水烫脚，一边和我叙谈。”我印象中，厚泽不止一次流露出对宋任穷的真切情感。

3、习仲勋乔石胡启立推荐说

我曾问朱厚泽：“除了宋任穷提名外，还可能有谁？”

他回答：“谁推荐我，我不知道。说由宋任穷提出来也好，由习仲勋提出来也好，这都有可能。因为他两个人当时在中央管干部嘛。但是谁出的主意，这我就知道了，没有谁对我说过。”这里，朱厚泽用这样的语气提出习仲勋提名的可能性，应非随意之猜度。朱厚泽到中宣部一年之后，8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朱厚泽“三宽”讲话摘要，标题是《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习仲勋看后，极为赞赏，即邀朱厚泽到他住所（当时他们都在北戴河办公）吃西瓜，还让夫人齐心将当日报纸送给邓小平看。可以看出习仲勋对厚泽的器重和欣赏。

我又对厚泽说：“听吴明瑜（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是厚泽和我的好朋友）讲，可能是乔石提的名，当时乔石还在中组部长任内。”

厚泽听后笑道：“吴明瑜曾告诉我一个传说：有人攻击胡耀邦拉团派，还拿朱厚泽做例子。因为我原来做过青年团工作嘛，不过那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还是冯文彬。当时乔石就说：朱厚泽怎么是胡耀邦拉的团派呢？朱厚泽是我建议来做中宣部长的嘛。”

厚泽还说，之前他和乔石没有多少接触，只是到京汇报贵州班子时，乔石在场。我说：“1985年8月19日你正式到中宣部报到、亮相，恰是乔石代表中央书记处送你去的，而且还讲了话。虽然当时他的身份已是中央政法委书记了。这不也说明你任中宣部长似乎和他有什么特别关系吗？”朱厚泽只是笑笑，没有再作解释。我还知道，1986年秋，中央有权威人士对厚泽的“三宽”讲话有非议，是乔石提醒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下去了”。朱厚泽非常感激乔石对他的关照和爱护。

至于胡启立推荐朱厚泽之说，就更不鲜见了。

1982年开十二大，朱厚泽和胡启立就有了接触。

1984年胡启立随耀邦到贵州，他和厚泽接触交谈就更多了。特别是胡启立继习仲勋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后，对厚泽的思想倾向和工作能力自然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朱厚泽自己也说，在他任中宣部长之前，和中央领导人接触最多，谈的最多的当属胡启立。

1985年6月上旬中央书记处会议基本确定朱厚泽任新中宣部长后，派胡启立于6月26日赴贵州找朱厚泽谈话落实。朱厚泽曾和我谈起那段情节。

胡：“中央要让你做宣传部长，我们将来要共事，我得先来找你聊一聊呀。”

朱：“你们从历史上数一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哪有像我这样的人当中宣部长啊？要么是老革命，经验丰富，老资格的，要么是学问很高的。”

胡：“你怎么这样看问题呢？现在新老交替，老同志要退下去，年龄大的要退下来，这是自然规律。另外，中宣部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部门，不能光叫搞意识形态的人来当，

不能光是从原来写文章、搞理论、管报纸刊物这样的人当中来选择，要找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才行。”

朱：“这样的人有的嘛，任仲夷同志不是现成的摆在那里，他是老革命，非常有经验，而且思想理论水平又那么高，那不是很好吗？”

胡：“任仲夷同志年岁大了嘛，你又不是不知道。”

朱：“年纪轻的也有嘛，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就很合适。”

胡启立不说话，朱厚泽不知其故。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有人要倒胡耀邦，就借晋江假药案来整肃项南，陈云已批示以中纪委的名义处分项南。胡启立知道情况，只不便向朱说出。

最后，朱厚泽恳请胡启立向中央报告自己难就此任的意见。

胡启立表示：“我一定按你的原话向中央报告，但你要做好准备，你跑不掉，已经定了，就这样”。

“那么，你来兼部长，我来当副部长。”朱厚泽接茬道。

“副部长还跑到这里来找你！”胡启立坚决地回绝道。

1985年7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下文免去邓力群中宣部长职务，任命朱厚泽任中宣部长。

二、任中宣部长前的朱厚泽与胡耀邦

朱厚泽多次说道：“我当中宣部长，从一开始到耀邦去世，从来没有听耀邦说过，是他提的名。”但事实证明，胡耀邦是一直看重朱厚泽的，认为这个中宣部长是选对了的。因此不管是不是胡耀邦点的将，人们有理由认为：朱厚泽接替邓力群任中宣部长，反映了胡耀邦的意志。

1、李锐推荐朱厚泽

公开明确说自己推荐朱厚泽任中宣部长的，李锐当属第一人。在朱厚泽病重期间，有一次李锐老和我说，是他向胡耀邦推荐朱厚泽当中宣部长的。他说，在这之前他没向任何人透露过。

李锐在厚泽去世的当天，在他写的悼文《铁肩道义更优先》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同厚泽相识，是1982年3月，到中组部建青干局时，他正在中央党校青年干部班学习。我的二姐李英华（已去世）当时是在这个班任实际负责的副主任，她特同我谈到，朱厚泽是班上最优秀的，排第一位。厚泽是贵州人，抗战后期，二姐曾在贵州地下党长期‘隐蔽’过，很了解贵州情况。同厚泽有了来往，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也曾长期下放十多年，吃苦不少。但借此时机，他读了许多书，尤其自学了自然科学，深深认识到没有科学知识办不好事。……正是一致的观点，使我们很快成为至交。1982年下半年，我曾请耀邦同志到这个班讲过两次话，他认识了许多学员，也认识了厚泽。他对厚泽还说过这样的话：事情都有两重性，十多年不工作，是荒废了，但是意志的锻炼，思想的开放，也是丰收的十年。”

李锐说：“十二大后，厚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贵州担任过二把手和一把手。耀邦到贵州广泛考察时，大讲经济开放，要藏富于民。于是厚泽在《贵州日报》上，用整版篇幅，连续宣传耀邦这一主张。由于曾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过，我是一直关心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和邓力群长期掌管意识形态，影响改革开放，我是很不安的。于是向耀邦推荐厚泽担任中宣部长，耀邦早就看重这个人才。”

李锐所言，当然可信，1984-1985年正值李锐在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任上。

2、“第一次没有见面的接触”

朱厚泽和胡耀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与朱厚泽平反复

出有关。

1978年冬，朱厚泽与伍嘉谟（原贵阳市委第一书记、省委常委）、夏页文（原贵阳市委第二书记、负责常务工作）到北京找中组部，要求解决贵州四清冤案。当时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他们没有找到中组部长胡耀邦，找到原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希望帮助解决平反和工作问题。李井泉经历了文革的生聚教训，对他们非常理解。谈话间，就给胡耀邦打了电话，报告了朱厚泽等人反映的问题。耀邦对贵州四清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对四清的错误及给干部带来的冤案是心中有数。因为他本人“四清”期间在陕西就曾遭整肃。耀邦让李井泉转告朱厚泽等人不要着急，说会议结束后通通解决。李井泉还向耀邦建议：因贵州四清时，曾派了两千人到贵州夺权，这些人后来大部还留在贵州。为了避免隔阂，是否考虑把四清中被整肃的干部调出贵州安排工作。耀邦表示可以考虑。于是，李井泉择日把贵州省委书记马力叫到家里。厚泽等人把情况汇报后，李井泉讲了自己的意见，又转达了耀邦的意见。马力完全改变了之前拖着不办的态度，不仅表示要解决问题，而且还提出让大部分人回贵州。1979年春节后，厚泽回到了贵州，恢复了党籍，安排了工作，任市委秘书长，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这件事实属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方针、举措的落实。朱厚泽称这是他和胡耀邦“第一次没有见面的接触”。

3、在青干班和十二大

1981年冬——1982年夏，朱厚泽到中央党校第二期中青班学习。当时，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正在考虑干部新老交替的问题，所以对中青班尤为关注。耀邦两次在中南海给他们做报告，而且把他们叫到中南海和玉泉山进行个别谈话。朱厚泽回忆说：谈话时，耀邦没有讲什么话，主要是问家庭情况、个人经历，以及对一些问题，特别是形势和改革开放问题的看法。朱厚泽当时对胡耀邦的看法是：“这个人非常真诚、非常热情，下级可以和他讨论问题，能够与青年人交换意见，没有传统领导干部的那种架子。思想解放，很多问题看得很开，大家与他谈话没有什么顾虑。”

1982年夏，朱厚泽被贵州省推举为党代表，参加中共十二届党代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朱厚泽参加了由胡耀邦组织的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与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邓颖超以及老师们的见面会。胡耀邦把这些年轻人一一介绍给老同志。回省后，12月底，中央通知朱厚泽任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名列第一书记池必卿之后。

4、耀邦几次视察西南

朱厚泽说：“与胡耀邦真正接触得多，是耀邦到西南视察，包括耀邦到贵州和我到云南。”这都是1983年以后的事。

1984年元旦，耀邦发着高烧，冒着风雪驱车来到贵阳。元月8日之前，厚泽和池必卿一直陪同胡耀邦，也使他们有了更多近距离的接触。

在贵州期间，耀邦约来西南各省市主要负责人到贵阳共商四省五方（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开发、发展、协作大计。1月4日，在发展战略讨论会上，耀邦问：“像你们贵州这样，能源这么丰富，有色、黑色金属资源这么丰富，全国有哪些地方可以比？”没有人起来回答。朱厚泽见状，从容不迫地回答道：“贵州的资源是综合的，能源、有色、黑色金属匹配在一起，是综合优势。”耀邦听后高兴地说：“对了，就是要有这个概念。别的地区某项资源很突出，但不匹配，能源、有色、黑色综合在一起，可能西南第一。要把眼光放在这上面。要提请中央注意这个特点。”

1月5日，耀邦同志在会上提出要把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开发提到全国战略高度。朱厚泽有一段插话：

“青藏高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云贵川处在它们的中间阶梯。云贵川对平原是能源资源的支撑。再往上阶梯开发，云贵川又是立足点。把这个中间阶梯放在战略要点上，非常

重要。从生态讲，也要抓长江、珠江上游的生态保护。最近二三十年，长江总流量下降近一半。干流、支流都要开发，应先开发支流。干流开发了，而支流生态没有解决，不能保护干流。先开发支流，资金也可以少些。要从支撑华东、中南着眼考虑云贵川问题。”厚泽把这个观点概括为“治理支流，屏障干流，开发支流，促进干流”。

厚泽话音一落，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表示赞同，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也发表了相同的观点。耀邦当即予以肯定。

以上内容是贵州日报社社长刘学洙的现场记录，他在回忆文章《我眼中的朱厚泽》中赞叹道：“朱厚泽真是一个想大问题、出大思想的人！”这也应是耀邦和中央一些同志看重他，选择他当中宣部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1月7日下午，胡耀邦在贵州省干部大会上讲话。耀邦提出：“党的一切政策归根到底都是富民政策。”朱厚泽后来回忆说：“耀邦同志响亮地提出：什么是我们的总政策？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富民政策’。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否尽快地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是党内评论是非一条重要标准。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不要老害‘红眼病’”。

胡耀邦在那天干部大会上，冲着朱厚泽说道：“你吃苦头了，朱厚泽‘四清’吃苦头了。”特别讲了“四清”问题应当如何处理和解决。

1月9日，厚泽和池必卿把耀邦从铜仁送到湖南凤凰岭。接着贵州省委立即召开电话会议，朱厚泽代表省委，以省委的名义，按照耀邦讲话的精神，重新布置工作，并把耀邦讲话精神传达到各级党委。强调要坚持胡耀邦提出的“富民政策”，全心全意使人民群众尽快富裕起来。1月15日，《贵州日报》详细报导了厚泽讲话的内容，其中许多话就是耀邦的原话。从厚泽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和耀邦的心心相印，与之后胡乔木、邓力群对耀邦“富民政策”的恶毒抨击，形成鲜明对比。

1985年春节期间，胡耀邦又一次到云南考察，讨论云南工作，朱厚泽和云南周边各省领导也被邀参加。2月24日，耀邦在云南省干部会上讲话，当讲到新老交替问题时，突然点了厚泽的名字。耀邦说：贵州省下一步的工作，由朱厚泽主持。并让朱厚泽站起来。厚泽只好站起来，向会上的云南各级干部鞠躬致意。厚泽后来向我讲这段故事时还笑道：“所以云南人知道我要在贵州主持工作比贵州人还要早。”耀邦此举不难让人看出他对厚泽的器重和钟爱。

三、朱厚泽个人条件和素质

总之，朱厚泽当中宣部长究竟是谁的举荐似难以结论。但可以看出，朱厚泽在当时可以算是当局普遍可以接受的人，大家普遍地看好他，这自然与他个人的条件和素质有关。

第一，他有年纪优势，是所谓“年轻的老干部”，解放前就参加共产党，领导过学生运动，50出头已就任省委第一把手。

第二，他不仅能写能说，有较高理论和知识素养，有驾驭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工作的能力，而且他有很强的实际工作、行政管理工作的能力，从基层经济工作开始，做过厂长、经理、党委书记、工业管理局长、经济委员会主任、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直至省委书记，这些条件和素养，完全符合干部新老交替的条件，符合中央在新时期选任中宣部长的要求。

第三，他不仅能力和见识过人，而且为人宽厚、谦恭、严谨、踏实、清正、朴实、勤奋、好学，和他接触过的中央领导，对他都会有好感，加上他在“四清”中因正确主张受到极左势力的整肃之后并没有颓废，而且利用这个机会读了大量书，包括大量自然科学的书，深入了解了許多社会和民间情况和问题。因此，更增添了人们对他的同情和尊重。

1985年7月上旬，朱厚泽在贵州就接到中央任命中宣部长的通知。不日，新任贵州

省委书记胡锦涛到任，朱厚泽用自己的方式和他进行交接——引导他沿贵州边境贫困山区转，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下面汇报、一边议论，帮助他了解情况。还没有转完，走了十几个县，即接中央电话，让他速去北京，参加北戴河会议。从此朱厚泽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求学于斯、工作于斯、遭难于斯五十年的贵州。命运又一次让他到北京——这个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去扮演一个悲剧角色。

(2013 年 5 月 3 日)

中宣部处理马丁事件和秦柳方事件始末

编者的话：《中宣部处理马丁事件和秦柳方事件始末》一文叙述了从“马丁事件”到“秦柳方事件”，再到整胡耀邦和于光远的两场“生活会”的过程。

在这个一波三折的过程中，最高权力隐约的身影渐渐清晰，从后台走向前台，直到在批胡“生活会”上亮相。至此，平衡术的第一局结束。要在经济上走资，对“自由化的根子在于经济”这类讲法当然不能接受。另一方面，一旦权位巩固，对政治上的“自由化”则更加不能容许。

对于胡乔木、邓力群与另一方的胡耀邦和朱厚泽而言，问题是简单的。双方都认为经济与政治的自由是相关或一体的，不同的是前者要加以抵制，后者却认为那是值得追求的。而最高权力要干的则是各取一端，要以“经济发展”替换破产的意识形态，借以挽救岌岌可危的一党专政。换言之，它并不认为经济与政治自由的相关性，而认为经济上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支撑政治上的不自由。甚至可能认为只有这样政治上不自由的制度才可以延续，只要能够防止经济上的开放蔓延到政治领域就行了。

马丁事件和秦柳方事件与批胡耀邦和于光远的“生活会”就反映了这一过程。两个“事件”可以看作经济自由化的风信标，而两个“生活会”表明，最高权力感到了并竭力要扫除威胁，以维护政治上不自由的制度。

1986年2-3月，经济学界发生了两起风波，一曰马丁事件，一曰秦柳方事件（确切地说，应是“马丁文章事件”和“秦柳方上书事件”），都是有人将改革开放中经济学界的探索研究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加以批判，并且受到胡乔木等中央负责人的重视和支持而引发的。朱厚泽到中宣部任部长刚半年，这两起事件，中央都交给朱厚泽处置。当时我是中宣部理论局工作人员，经历了这个过程。

2月24日，朱厚泽接到胡启立批给他的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380期（2月21日）。该期《清样》转登了纽约《中报》批判马丁文章和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的社论，上面分别有2月22日薄一波和2月23日胡乔木的批示。

薄一波批示：“启立同志抽空一阅。是否请厚泽同志把各方议论合起来，研究一下。建议将马丁文章和这篇《清样》一起印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顾委常委一阅。此件用后仍退我”。显然，薄一波是想把此事搞大。

胡乔木批示更煞有介事：“启立同志：建议将此件印中央参阅文件。原文所引工人日报文章因住院不便查找，希中办代查附后。但此件意义重大远超出一两篇文章之上。当否请酌定。”胡乔木显然没有看到原文，他光看《清样》便断定：“此件意义重大……”。

2月24日，胡启立批示：“按乔木，一波同志批示办。”

所幸的是，朱厚泽是冷静、慎重而明智的，他没有跟着胡乔木、薄一波的情绪起伏，在查对了马丁原文后，便明白了就里。他委托王惠德和理论局同志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认真查核研究。

王惠德不仅是中宣部分管理论工作的负责人（按：王惠德当时已由副部长退为顾问），而且是党内公认的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资本论》研究专家，由他主持研究此事，自然是具有权威性的。但是，他接受此事时，还是心存忧虑，他看到来头不小，来势汹汹。他先找了理论局同志进行商讨，开了两次内部会，并在我们面前表露了忧心忡忡的情绪。理论局一些同志经查核、查阅、比对、分析了《工人日报》、《北京周报》署名马丁的文章和此后涉及马丁文章的有关报刊，走访几家当事单位（即刊发或转载马文的机构），并将胡启立批给朱厚泽的薄一波、胡乔木的批示转告他们，基本上弄清了来龙去脉，看出《国内动态清样》（380期）和纽约《中报》对原文原意有严重不实和歪曲，建议在学术界通过讨论澄清是非曲直。这使王惠德的态度也变得更加明朗起来。经查：

1985年11月2日，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宋龙祥以“马丁”的笔名在《工人日报》〈社会之声栏〉上发表《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变化》。全文不到七千字，所谓“十大变化”是指：一、从批判经济学转向建设经济学；二、从对经济政策的理论阐释转向科学分析；三、从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排斥、否定转向分析借鉴；四、从生产关系的研究转向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五、从经济关系的一般研究转向经济运行机制的具体研究；六、从经济的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七、从理论经济学转向应用经济学；八、从微观经济转向宏观经济、从短期规划转向长期战略的研究；九、从孤立的单向度的经济学研究转向综合的多学科的社会经济研究；十、从线型知识结构转向复合型知识结构。

文章关键的话语有两段：

一是，“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不再是批判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了，而是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这一更艰巨的历史任务。……而这些在《资本论》或其他任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因此，中国经济学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走出来，而应该从生动的事实出发，创一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学。”

一是，“今天，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待传统庸俗经济学的科学态度来重新估价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我们认为，当代西方经济各派的下列思想成果尤其不容忽视：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以及通过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促使流通和消费对生产积极反作用的理论；新剑桥学派对收入分配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科学的批评、分析、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上述成果，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是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不难看出，这篇文章并不是研究评价《资本论》或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著作，只是对当前我国经济学研究状况的一篇述评。作者所概括的十大变化和他两段带有结论性的关键话语，虽然不算十分精确，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同年12月的《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工人日报》马丁的文章。

12月9日，《北京周报》英文、日文版同时详细摘登了文章的译文，个别地方作者还做了增补。内容与《工人日报》的文章无甚出入。

12月11日，日本时事通讯社报导《北京周报》摘登马丁文章800字的消息。报导说：马丁主张要明确指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失去有效性，并大胆引进凯恩斯等西方近代经济学的成果。经核对《北京周报》译文和《工人日报》原文，未见这样的字眼，也没有这样的意思，纯属日本记者的主观论断和歪曲。

12月11日、12日，日本《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先后刊发了时事通讯社对《北

京周报》马文的报道——“马丁认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已失去了有效性，并呼吁大胆采用西方当代经济学的成果”。《朝日新闻》在报导消息时还加了一个 500 字的注释，捕风捉影地说：刊登马丁文章是“党中央的主流派”要“试探国内的反响”。于是在海外引起普遍关注。

12 月 19 日，纽约一家华文报纸——《中报》根据《读卖新闻》的报道，发表了一篇颇有倾向性的题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论中国对经济学研究应有的态度》的社论，指责马丁文章“明白指摘《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失去其有效性’”，“主张大胆引进凯恩斯等西方近代经济学的成果”。声称“我们希望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界扬弃学术功利主义的想法和食洋不化的作风”。新华社驻联合国记者发回这篇社论。

12 月 21 日，香港《中报》也登载了这篇社论。（后来《中报》声明，他们发表这篇社论时，并没有看过马丁发表在《工人日报》和《北京周报》上的原文）。

此后，值得注意的动向是：

12 月 25 日，新华社《参考资料》以题为《纽约〈中报〉社论谈我国的经济学研究问题》，全文转登《中报》社论。

1986 年 1 月 25 日《红旗》杂志主办的内刊《理论交流》也转载了《中报》社论，并以“纽约《中报》论我国经济研究”为题。

2 月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在一次企业管理会议上，抨击马丁文章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6 年 2 月 21 日，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经济参考报》主编喻权域把纽约《中报》的社论编成《国内动态清样》第 380 期，其醒目标题为：《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有强大生命力》。标题的前句话是《中报》社论的话，后句话社论中没有，系喻权域添加的。《国内动态清样》是新华社直通中央的内参，所以引来了上述薄一波和胡乔木等中央大员的批示。

3 月 4 日，新华社主办的、公开发行的《经济参考报》又发表《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强大生命力——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报导了《中报》社论。以上不难看出，新华社、红旗杂志和邓力群等人的互动关系。

之后，《北京周报》和《新华文摘》都曾致函要求新华社澄清事实，作出纠正。《北京周报》还曾两次致函。

在看到薄一波、胡乔木批示后，3 月 13 日和 14 日，北京日报社和人民出版社又分别给中宣部写了报告。他们用事实严正陈述了从《朝日新闻》、《读卖新闻》转发日本通讯社的报导，到纽约《中报》发表社论，再到新华印发 380 期《国内动态清样》，一步步对马文形成的严重歪曲。

北京日报社的报告特别提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央重要耳目的《国内动态清样》的编者，把这样一篇与事实根本不符而分量又很重的批评文章，未经认真查对其批评的根据，就刊登在《清样》上，惊动了好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而且此件还要转发给所有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如果此事不作澄清，不仅马丁同志本人，而且中国的经济学界，都会在中央和各部门领导同志中留下错误的印象。”

人民出版社的报告还指出：纽约《中报》社论是西方新左派的观点，旨在吹嘘其激进经济学派的经济理念，绝无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的意思。《中报》是把《资本论》说成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国内动态清样》则把西方新左派的激进经济学派与马克思的经济学混为一谈了。

3 月 20 日、22 日，中宣部在放映厅邀集有关部门的一些权威学者、专家进行研究座谈，并印发了《工人日报》发表的马丁文章的全文、海内外涉及马丁文章的资料和北京日报社、人民出版社给中宣部的报告。会议由王惠德主持，应邀参加者据我的记忆有：中顾

委委员、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经团联秘书长冯兰瑞，《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苏星，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董辅弼，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顾锦屏，人民出版社前社长曾彦修、社长张惠卿、副社长薛德震，《工人日报》评论部主任李禹兴，《北京周报》代总编汪永芬等，加上理论局副局长理夫、贾春峰及工作人员共三十多人。

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喻权域也应邀到会。开始，他还以为他编的这期《清样》得到中央领导赞赏，一派踌躇满志的神色。但会议一开，大家发言热烈，他便成了众矢之的。到会专家学者很快取得共识：

(1) 马丁文章应属改革开放中经济学界探索文章，确切地说，只是一篇概括评述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学研究现状的文章，而不是一篇论述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论文。不存在“食洋不化”或否定《资本论》现实作用的问题。

(2) 纽约《中报》社论，特别是《国内动态清样》(380期)对马丁文章的认识和评论，有严重偏颇，所掀起的风波给作者带来的政治伤害是严重的，应还其清白。

(3) 经济体制亟需经济理论积极探索的支持；把它看作“自由化”加以政治化，应是“文革”遗风，对改革开放极为有害；呼吁中央切实保证学术自由，贯彻“双百”方针。

于光远发言认为：马文是一篇重要文章，值得哲学界、经济学界注意和讨论的文章，《工人日报》完全可以发表，《北京周报》作了摘转，使国外了解中国理论界近年来做了不少工作和探讨，对驳斥国外污蔑中国“学术无自由”，也是很有好处的；作为《新华文摘》，转载更是理所当然。

冯兰瑞说：近年来理论界气氛比较紧张，这与个别同志“谎报军情”，干扰领导同志决策关系很大。

董辅弼说：建议中宣部对个别向中央领导同志谎报理论界“军情”，又不愿将自己的不同意见写成文章来公开讨论的同志进行批评帮助。

汪永芬说：可以借马丁文章一事来提醒新闻界、理论界的同志注意，进行批评要实事求是。

王若水说：向中央反映情况是需要的，但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应提倡信息公开，至少保证作者本人知道。

于光远说：理论界应提倡点名批评。

会上有人问喻权域，根据什么编了这期《清样》？为什么还对《中报》社论“加油添醋”？喻回答：“只是看了《中报》的社论，没有查看《工人日报》和《北京周报》原文”，并做了自我批评。在3月22日的会上，他还带来3月21日新华社新发的一期《国内动态清样》(624期)，内中以《日本报纸报导〈北京周报〉的文章有歪曲，纽约〈中报〉对马丁的批评不科学》为题，对380期《清样》的错误做出了解释和纠正。

3月24日，经团联召开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讨论会。专家学者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马丁风波问题，大家认为应从马丁风波中吸取教训，使其成为贯彻“双百”方针的契机，切实保障学术探讨自由，这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战略。

4月5日，中宣部理论局印发《关于马丁文章的座谈会简报》，《简报》概述了座谈会的缘起和基本情况；概述了马丁文章怎么一步步被歪曲，酿成“马丁事件”；概述了座谈会发言的内容，特别是呼吁接受“马丁事件”的教训。这份简报是由理论研究处同志起草，理论局长卢之超压了一段时间，又作了些修改后签发。

此后，海内外媒体也纷纷就马丁风波及教训发表消息或评论。如4月12日，《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于光远文章，建议把马丁文章的讨论，作为取得贯彻“双百”方针经验的机会；4月25日，香港《文汇报》报道了马丁风波的有关消息；4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苏双碧文章，呼吁不要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5月1日，《北美日报》就马丁风

波及其教训发表社论；5月2日纽约《中报》发表编者文章，对有关批评做出回答。等等。此外，有些省、市、自治区宣传部或社科院也开展相关的讨论。大家都纷纷引述并高度评价赵紫阳在某次会上的讲话：“改革要以理论突破为先导，对不同意见不要随便扣‘保守’或‘自由化’的帽子，而应该鼓励大胆自由探索”，和朱厚泽4月22日在理论局召集的首都主要报刊和社科院有关研究所理论座谈会上的讲话：“必须创造一种环境和气氛，鼓励、提倡理论工作者开展创造性的研究工作。”

赵紫阳和朱厚泽的讲话，等于是为这场持续数月的风波做出了结论。

朱厚泽在接到胡启立2月24日关于马丁事件的批示的九天之后，又接到一份胡耀邦批给他的秦柳方反映经济理论界“自由化”问题的报告，当时也被称作秦柳方事件。

秦柳方是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一位年长学者，于1986年2月22日，就他所看到的“最近一段时间，经济理论还存在一些混乱现象”写了一份名为《经济理论的一些情况》的报告，送交胡乔木、邓力群和胡绳。他把《经济研究》、《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等报刊发表的有关建立劳动力市场、让农民进城、建立资金市场、改革金融体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股份化等等，都视为“自由化倾向”，其中包括他从新华社《参考资料》看到的马丁文章，要求中宣部、社科院以及负责经济体制改革的部门研究解决。

胡乔木看后，也许认为报告的水平偏低，只作了如下批示：“作为一家之言，可以看看。”他还是希望中央加以注意，所以，3月1日他又将这份报告和他的批示送给赵紫阳和胡耀邦。

3月3日，赵紫阳写下如下批语：“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需要的是大胆探索。”

3月5日，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请厚泽同志将紫阳同志的批语转告乔木同志一下。”

朱厚泽一面向胡乔木报告，一面在部务会上通报，并要求王惠德和理论局研究贯彻耀邦和紫阳的意见。

王惠德和理论局同志开了一次内部会议，又开了一次首都报刊和理论部门负责人的会。大家高度赞扬胡、赵的态度，认为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要鼓励对理论的大胆探索，出现不同意见的争鸣是不可避免的；下面有打小报告的，有乱上纲上线的，有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的，其实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中央同志的轻率表态，令有些人有恃无恐；中央的职责除了科学制订方针政策和保障方针政策实施外，十分重要的一环，就在于保护研究探索者的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

两段风波至此告一段落。

然而，事隔不到一年，1987年1月，邓小平策划“生活会”，罢黜了总书记胡耀邦；不久，朱厚泽也被免去中宣部长职务；接着，3月16日，中顾委召开了“批评和帮助”于光远的“生活会”。这个会是由邓力群致函薄一波、伍修权，以书记处名义要求开的，邓力群在信中所列于光远四大问题之首，就是“制造‘马丁风波’”。为给“生活会”批于光远制造“根据”，邓力群还指使他的得意弟子卢之超以理论局名义编造了一份于光远问题的材料，我和韦典华等理论局的几位处长竟毫不知情。更卑鄙的是，尽管顾委会决定，参加“生活会”人员只限中顾委常委、机关党委成员、各支部书记，但邓力群还亲自指定了包括真正制造了“马丁事件”的喻权域等一伙人参会批于。“生活会”共开了九个半天，3月21日结束。

喻权域在“生活会”上专门就“马丁风波”讲了两个小时，极尽贼喊捉贼之能事。喻权域公然隐去他在理论局座谈会上认错、检讨的事实，竟编造出一场在会上与于光远的争论的“情况”，把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说成是“于光远指挥的”；甚至说，日本时事通讯社没有歪曲马丁的文章；他还冲着会上老同志狂言：“希望一些老同志不要‘打横炮’！”所

谓“打横炮”，就是唱反调。可见风向一变其有恃无恐到何等地步！

会后，为了进一步诋毁于光远，邓力群又布置在中宣部、社科院等部门对“生活会”的“成果”进行传达。

这场由邓力群导演的“生活会”，由于于光远的强烈抗争，最后只能草草收兵，不了了之，但其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特别是，去年中宣部正确处理“马丁事件”颇得人心，而这个会公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翻了它的案，引起坊间的极大愤慨，纷纷谴责这个“生活会”的“不实事求是”、“岂有此理”，普遍认为这个会开得“莫名其妙”，“有人在借机会整人”。冯兰瑞等知情人甚至对如此故意制造混乱的行径提出“抗议”。这场“生活会”成了邓力群有恃邓小平、陈云的强权，组织文化打手，进行颠倒黑白，陷害忠良的一次历史记录。

二十年过去后，朱厚泽和我回顾马丁事件和秦柳方事件这段历史时，他特别突出地谈到两点：

一是，实践证明，在我们这种体制下，“内参制度”往往会被党内某种政治势力或利益集团利用，造成上下呼应、沆瀣一气，达到颠倒黑白、陷害异己、保护既得利益、阻碍和破坏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

第二，马丁事件和秦柳方事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而是自“清污”以来一直存在的认为“自由化”的根子在于经济的翻版和继续。

(2013年5月3日第一稿；2014年4月15日第二稿。关于于光远先生生活会部分，参考了冯兰瑞《马丁文章”事件始末》和王晓中《中顾委开于光远生活会》等文章。)

忆孙姨

编者的话：《忆孙姨》一文记述了作者与孙嘉瑞女士一家多年的友谊。

上世纪三十年代，女作家梅娘红遍大江南北，与当时的女作家张爱玲齐名，世人并称“南张北梅”。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梅娘消失不见了，只剩下了右派分子、劳改犯、街道管制分子和五类分子孙嘉瑞。一度驰骋文坛追求进步的青年女作家也变成了底层挣扎求存操持生计的老妪。就像她自己说的，已经忘了梅娘这个名字，也忘了那些小说和小说中的人物。历史的断裂，不但改变了人的外部环境，也改变了人的内心与记忆。这个断裂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笼罩着许许多多的人，也笼罩着这个国家。也许这就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

我和孙嘉瑞老人相识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的女友(后来的妻子)梁其利与她的女儿柳青是艺术院校学生在张家口的部队接受“再教育”时的战友。文革后期大家都无所事事，所以我们常到她们家串门。她们家在北京东四六条流水巷11号，我们家在沙滩北街乙2号，步行去也只需20分钟。

那时，我已年过而立，孙姨已年过半百，应是我的望年交；我还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而她也戴着“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帽子”，彼此接触起来，不觉得有什么距离，也算是患难之交。我随其利叫她孙姨。

当时我们还有个所属单位，每月发四、五十元的工资，而孙姨早在反右运动中就被开除了公职，没有工资收入，全靠给街道工厂做些针线活，赚取微薄收入权以度日。有时还兼给人家当保姆，贴补家用。在此之前，她甚至还到车站扛麻包、到建筑工地当壮工。

和她接触过程中，我还多次看到她被派出所或居委会勒令去扫街、挖防空洞或汇报思想，

这是文革中对“五类分子”的威慑措施，特别是在有重大活动或节庆的日子，就更要体现“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的最高指示。

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长期残酷的精神折磨，使她的双手和面庞显得十分粗糙而布满皱纹。但是，依稀可见秀丽的轮廓，特别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仍显现出一种非凡的风韵。

孙姨能做一手好饭菜，我们印象尤深的有红烧带鱼和芥末墩儿，至于她包的饺子更令人叫绝。她的生活如此拮据，可是我们每次去看她，她都会慷慨地款待我们。现在回忆起来，仍令我们心痛。其利至今还记得，1974年我们结婚时，老人家还亲手绣制了的确良的衬衣和裙子作为新婚礼物送给她，拉近我们之间关系，更主要的还是她的言谈举止。她不卑不亢，外柔内刚，不流露悲戚与痛苦；她言语清晰生动，逻辑性强，知识渊博，文笔老辣，字也写得很漂亮；她对两个幼小孙女的教育也颇有板眼……所有这些，让我感到她非同一般。虽然开始我并不了解她的身世，但我清楚，不少右派分子本来就是品学兼优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对她也就不见怪不怪了。说实在的，经受了文革“洗礼”，在我眼中的“右派”，不仅无过而且有功，他们是我们民族的先知先觉者。

我曾问过柳青：“孙姨怎么就成了右派？”

她回答的原话，我已记不下来，但大概的意思是：

我妈解放初是三十五中的教师，还曾被评为全市的模范教师，后来又转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当编辑。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组织把她当成“特嫌”审查，运动过后，“特嫌”的帽子算是去掉了，但因她有怨气，提了点意见，反右运动来了，就把她打成右派。

“为什么把她当‘特嫌’，是不是和你父亲有关？”我又问道。

柳青回答说：

是的。我父亲叫柳龙光，当年是北平有名的记者，因为兼做几份杂志，也可叫做出版商。他在1945年前，就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发生联系，和刘仁有直接接触。他曾接受共产党的委托做过蒙古王爷的统战工作，曾出资（由我妈变卖首饰）买药送给新四军，还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到解放区去。

1949年1月，他接受共产党的任务从上海赴台湾，遇太平轮海难逝世。当时，我五岁，妹妹四岁，我妈也只有二十八岁，她还怀着我的弟弟。当时台湾和日本都有机构聘请她，但她憧憬着新中国，经过限难险阻，还是决然带着我们姐妹从台湾回到了大陆。

生下我弟弟不久，经刘仁的关照，她参加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并结识了从解放区来的赵树理、马烽、康濯等作家；又先后当了中学教师和编辑。就因为我父母在全国解放前夕分别从大陆去台湾和从台湾回到大陆，肃反运动中便被视为“特嫌”加以审查。而此时刘仁等知情者也没有出面澄清。

“孙姨当了右派后受到怎样的处置？”我又追问道。

柳青应道：

1958年5月，有一天我刚回到家里，邻居就告诉我：你妈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之后农影派人通知我们三个孩子：她被划为大右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妈妈怕给我们增加精神负担，事前竟什么都没跟我们说。从此全部家务和照顾妹妹的担子就由我挑起。当时我才十五岁。

半年后，我才收到妈妈的来信，她一句没说劳改的苦痛，只是说些体贴鼓励我们的话。我妈去劳改前，我妹妹就因病重在协和医院住院。我妈劳改后，因住不起医院，民政局便把她送到清河社会救济院。劳教当局只允许我妈去看过一次病入膏肓的妹妹，没多久，妹妹就死在救济院。1962年2月，我妈劳改近四年后，因患肺结核保外就医才回到家里，她已经四十二岁了……

“文化革命以后呢？”我又问道。

柳青说：文化革命爆发，我妈作为“五类分子”自然首当其冲，被红卫兵、单位和街道

的革命组织抄家、揪斗，自是家常便饭。但是最使她撕肝裂肺的，也许是因为我和弟弟为“追逐革命”，竟然和她“划清界线”。我弟弟因出身问题，不能参加红卫兵，为叛逆家庭，独自离家步行串联到南方，不幸染上肝炎。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又无钱买药，病情急剧恶化，当回到家里，已经病入膏肓，不久就死在医院，而且还欠下医院一笔医疗费……

知道她们这些冤情后，我自然对孙姨更增添了一层同情。

由于上述原因，加上气质和观念上的相投，我们和孙姨及其家人的关系日益密切，两家渐渐成了世交。孙姨还做了我哥哥郑伯农和我嫂子李燕平成婚的红娘。她的两个孙女胡蓉和雁宝，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我们经常带她们玩。她们亲切地叫我二舅，叫郑伯农大舅，叫我妹妹郑立中姨。孙姨和我的母亲也以姐妹相称。柳青是电影学院毕业生，擅长摄影，当年我们家最好的照片都是她拍摄的。

“四人帮”垮台后，中国政治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动。

1978年，胡耀邦任中组部长期间，亲自为我平了冤案，不久我被调到刚恢复的中宣部工作。同年，在胡耀邦主持下，解放了包括孙姨在内的沉冤二十二年的数十万人的“右派分子”，在落实政策中，恢复了她在农影的工作。她的家也从流水巷的大杂院搬到双榆树的农影宿舍。我们都为她的新生而庆幸。但是，从那以后，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工作，而且两家相距又远，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

1986年收到到孙姨签名的赠书《长夜萤火》。这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东北沦陷时期女作家的小说集，收录了梅娘即孙姨的几篇作品。我才开始关注坊间对梅娘作品的介绍和评价，特别是对孙姨身世和人生不幸的议论。说实在的，由于我的孤陋寡闻，在1980年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梅娘是什么人，更不知道一代著名女作家梅娘就是孙姨。与孙姨往来五、六年中，也从来没听她提过梅娘，提过她曾经是作家。

1987年我调《新观察》杂志任常务副主编，我将孙姨介绍给主编戈扬，我觉得她俩的历史经历有共同之处。她们谈了近两个小时，十分投缘。孙姨比戈扬小四岁，称戈扬作大姐。戈扬约孙姨写一篇记述作为作家梅娘的历史。孙姨只淡然地说：二十多年曲折的经历，让我早就忘了梅娘这个名字，忘了当年我写过的小说，忘了小说中的人物。这不过是一段逝去的往事。

我已看到孙姨似有难色。我知道，1952年忠诚老实运动中，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1955年肃反运动中，清查汉奸；特别是反右运动中，为印证她的右派历史和思想根源，曾经的“梅娘”，不知给她增加了多少苦难。今天再去回忆它们，是很痛苦的。想到这些，我也很难受，只好说句模棱两可的话：以保重身体为主。不料，几天之后孙姨就送来一篇她写的自述，让我和戈扬都很感动。我斟酌后，定名为《找寻失却的梅娘》，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

风云入世多，光阴掷人急。自从1978年我和孙姨的冤案平反后，很快三十年过去了。2013年5月初，我接到柳青打来电话，告知孙姨因心衰住进304医院。柳青说了一段令我难忘的话：

昨天在病房里，我妈含笑地对我说，她不怕死，上次脚伤住院时，就有了死亡前的感受——眼前一切都是白色的，白房子、白衣服、白花……非常清洁、非常明亮，一点不让人恐怖。

柳青问我：这是否说明她心态很好？我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我们想去看看她。柳青说，等她病情稳定些再去。

然而她病情没有稳定下来，没有在死亡线上止步，继续向那白色光亮的世界走去。5月7日下午噩耗传来：孙姨于7日上午10时安详地走了，享年93岁。

5月9日，我和梁其利、郑伯农和李燕平、郑立中和妹夫刘德贵赶到304医院，和孙姨进行最后告别。孙姨平静地睡在花丛中。她的人生，太惨烈了，太屈辱了，太苦楚了，太劳

累了，但是她为了理想、为了儿女、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没有倒下，从不言死。只有到了油尽灯息之时，她才能自在地躺下，享受清静和安宁。我凝视着她那亲切而刚毅的面庞，想了很多很多……

她的青春时期的辉煌豪迈，和大半生的惨烈坚强，同样是伟大而不朽的。从人性的角度，她堪称一代的奇人、伟人、圣人！

她充满灾难的一生，向亿万中国人提出一个浩大的问题：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儿女，如梅娘（孙嘉瑞）者，他们怀抱天经地义的理想，为民主、自由、解放而奋斗，最后却落个家破人亡，而他们看到、得到的正是“文革”那样的祸国殃民的法西斯专制统治，这是为什么？我想，这也是孙姨一直在思考而至死未解之惑吧！

(2014 年 3 月 15 日)